

在中共历史上，蔡和森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他是系统提出中共建党思想的第一人，
是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第一任主编，还是国内第一部党史专著的作者。

.....

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

| 王文鸾 著 |

在中共历史上，蔡和森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他是系统提出中共建党思想的第一人，
是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第一任主编，还是国内第一部党史专著的作者。
.....

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

| 王文鸾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 / 王文鸾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08 - 1753 - 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研究方法 - 文集 IV. ①K26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0715 号

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

作 者	王文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 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1753 - 3
定 价	28.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这人爱好比较广泛，练过琴、画过画、自学过英语，还得过央视（当时名为北京电视台）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三等奖，但最后作为饭碗的却是党史。最初接触党史，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使然，而是改变命运的需要。我原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自认为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烟台大学举办的一个英语培训班，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学员，他说他们那儿的英语教师都在准备考研，并且已有几个考上了。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原以为考研与己无关，现在看来也并非高不可攀，可是考什么专业呢？听他说党史比较好考，尤其毛泽东思想研究方向更好考。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使用频率很高，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于是我就到这所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这就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关于党史方面的书。

我这人有个特点，一旦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哪怕再难。从培训班回来之后，我开始阅读能找到、能买到的所有党史书籍，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基本概念都很难理解，到对整个党史体系的基本把握，再到对党史问题有所思考，不知不觉对党史产生了兴趣，并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的最大收获就是读懂了导师谭双泉先生所强调的“写”字，学会了治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写出了一篇发表在《史学月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的论文。这一切无疑为我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

然而，市场经济带来了许多诱惑，加之高校理论课日趋边缘化，我对毕业后从事的理论课教学工作并不怎么看好，于是就想通过考博改一下专业，可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经过几年的努力过了一所名牌大学的民法面试分数线，最终却榜上无名，原因在于自己跨学科、年龄大，又无任何优势可言，所以并不怨天尤人。直到本单位有了硕士点，我才看到了希望，开始“改邪归正”，潜心久违的党史研究。几年下来，我从一个新领域的开辟，到权威期刊发文，再到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获批，也算一步一个脚印，可谓天道酬勤。事实上，做点所谓的研究很不容易，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当然，我还会继续走下去，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培养起来的这点兴趣，也为心灵深处的那份孤独。

以上是我对结缘党史心路历程的一点回顾，而本书却主要是我十几年来在核心及其他期刊所发文章的一次整合，也是我对党史学习、思考的一个小小总结。本人学浅识寡，文中疏漏甚至错误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作者

2012 年仲秋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民国事件人物论	(1)
一、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述评	(3)
二、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29)
第二章 党史人物事件论	(39)
一、略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41)
二、瞿秋白与五四运动	(46)
三、瞿秋白主编党报党刊的现实启示	(52)
四、蔡和森在中共历史上的三个贡献	(59)
五、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	(65)
六、“文革”改革与革命 ——兼评“告别革命”论	(73)
第三章 现代和谐社会论	(81)
一、家族主义与党的建设	(83)
二、六条政治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命运	(91)
三、健全教育法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基于教师权利及其救济制度的思考	(100)
第四章 历史研究方法论	(115)
一、中共党史解读的新视角 ——读石仲泉《我观党史》二集	(117)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方法	
——读石仲泉的三本著作	(128)
三、名著的瑕疵	(143)
第五章 史学理论基础论	(149)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内涵的经济解释	(151)
二、新中国成立前早期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考察	(163)
后记	(179)

第一章

民国事件人物论

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述评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格诸方面。政治上，他力促国家统一但走了一些弯路，由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经济上，他注重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对农村经济也给予特别关注，并系统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教育上，他出资办小学、中学和大学，提出了“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人格上，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荣利，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全面性、系统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践性；不仅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落实在爱国救国的具体行动上；不仅要求别人，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所谓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是指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兴旺等根本利益的关心和自觉维护的思想与行为。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尽管极为短暂，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并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发掘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

众所周知，张学良既反内战又打内战，既“剿共”又联共，既拥蒋

又疑蒋，直至“将天捅个漏子”，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力主进行和平解决。对此矛盾现象，学界认为是他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也是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使然。但这多是从客观方面来讲的，那么主观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从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发展变化入手，进一步探究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思想动因。

1. 息争统一，参与混战

张学良是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青年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他怀着“为中华民族造福”的理想，极力主张“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他认为，“惟和平乃能促成统一，亦惟统一乃能保障和平，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统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统一而不能和平者，连带关系”^①。他将和平与统一的关系，看作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站到发展国力的高度，论述了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②因此，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他通过观察体验认为：内战起因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认军队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稍不如意，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徒党和之，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仆彼继，往复效尤”^③；内战后果是“民生憔悴国势阽危”；性质是“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并得出“内战实为罪恶之母”的结论。他还将内战与亡国联系起来警告人们：“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环视我侧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④，并深信“中国若能5年或10年之内不发生内

① 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第3版。

② 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第3版。

③ 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第3版。

④ 《盛京时报》，1930年3月3日。

战，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进步，总较战局下之情况为好”^①。这说明，他对内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他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青年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他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但未能如愿，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却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支配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日本的“二十一条”使他痛下决心出来做事，要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样，努力以救中国。在他看来，他有家庭背景，有好的父亲，走一步等于人家走两步，“为何不利用这个条件作点什么？”尽管对“作点什么”还模糊不清，但却是他改变初衷接受父亲栽培的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因素。其次，在于他对战争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张学良19岁就参加战争，经历了剿匪之役、直奉战争和豫南大战并屡建功勋，年方26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同列。如果说张学良起初由于逆反心理，不愿当什么将军做什么军阀的话，那么，这时他已在“作点什么”的驱动下，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阀将领。但也应看到，他尽管也为争夺中央政权扩充地盘而战，但毕竟不同于他的父亲，不同于一般军阀。他不以争权夺地为目的，而以息争统一为宗旨，以战争求和平，以和平促统一。然而，他每次作战观于官兵伤之惨状，人们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尤其是河南视察所见，更使他触目惊心。曾慨叹，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为什么？徒招人民之怨恨得不偿失。正是这些不断积累的感受和体验才使他的内战观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肤浅发展为深刻。也正是这种深刻，才使他的“作点什么”由模糊变清晰，由参加战争到反对战争，再到制止战争，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1925年，他赞成郭松龄停止内战退守关外的政治主张，对他的倒戈失败深表同情，说他无罪不该处死；1926年，他以“同根相煎，胜亦何

^① 《民国日报》，1930年11月18日第4版。

足言功”为由拒绝了李寿金为攻克南口演剧庆功的提议；1927年，他在给胞弟的信中表达了参加战争的内心痛苦，并在屡谏父帅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感愤不已，决心“一旦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后来与北伐军作战，未经父帅同意在占领郑州后，给蒋介石连发三封息兵言和的电报，并放弃郑州，撤兵黄河北岸，保存了郑州军火库和黄河大桥；1928年，他又极力进谏，首次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了蒋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由此可见，张学良在遵行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主要思想动因。当然也应指出，在参与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 统一抗日，拥蒋、“剿共”

1928年父帅被炸身亡，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他就面临是在日人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还是顺乎历史潮流归顺南京政府的两难选择。经思虑再三，他毅然顶住内外压力，以中国为本位，放弃了父帅的老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不想做闭关自守的东北王，更不愿做日本人的傀儡，他首先考虑的是东北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也只有改弦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人之手。结果正如愿同，由于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在老师时代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少帅时代同样没有得到，而且也使他们的已有特权不断缩小，妄想控制东北、指导“东北自治”的阴谋得以破产，从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统一。显然，这时张学良的统一观已由统一息内争发展到统一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为有效地制止中原大战通电全国，决定尽其可能，重建国内和平，第二天他率兵入关武力调停。奉军这次入关与

前三次决然不同，不是争夺地盘扩充势力，而是有意助蒋统一，实现国内和平。在他看来，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而在各派力量中能做到统一的最佳人选，非蒋介石莫属。尽管蒋也不可靠，但较之北方军事联盟确略胜一筹。因为北方军事联盟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这个联盟得胜，日后各派也难免纷争破裂。总之，他的逻辑是只有拥蒋才能统一，只有统一才能息争御侮。事实上，他的这次军事干预确使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得以结束，达到了息争统一苏解民困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也就是说，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反而使外敌乘虚而入，这就造成了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判断失误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再失热河，被迫下野出洋。“考察”归国后，他又借鉴德意两国民族复兴的经验，鼓吹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而蒋介石这时奉行的逻辑是：只有先消灭红军，才能做到真正抗日，即“攘外必先安内”。这与张学良统一抗日的统一观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蒋介石的统一手段是“剿共”，而张学良的统一手段却是拥蒋。尽管张学良对内战深恶痛绝，但为统一抗日计也就“不得已而为之”，并担任了“剿总”副司令。其实，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逻辑，因为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她所领导的红军也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抗日劲旅，很明显与其作战便是对抗日力量的自我摧残和削弱，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遗憾的是张学良一开始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还想通过“剿共”表现一番，取得蒋的信任，并借机重整东北军的旗鼓开赴抗日前线，以达披甲还乡明耻复土的目的。然而，“剿共”战争的实践无情地向他昭示，不但共产党打不了，反而毁了自己的部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战死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不能不给张学良的思想以一次极大的震撼。对此，蒋

介石毫无关切之意，反而借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甚至连张学良为阵亡师长家属所申请的十万元抚恤金也被拒绝，以至他悲愤道：“我的名望，已降到不值十万块钱！”这又给他悲凉的心情雪上加霜。加之东北军将士对民族危亡惨痛的深刻体验和深受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埋怨情绪日高。他们认为，东北军的天职是打日本人的，而不是打自己的同胞。他们背井离乡，胸中燃烧的是民族仇恨的怒火，怀着复仇的壮志，要求张学良“打回老家去”。对此，不仅一些高级将领，就连张学良本人也深有同感。他扪心自问，痛切反思：想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代蒋受过，受到国人的指责；看现在，挨着红军的打，受着中央的气，遭到部下的埋怨，同时由于国难家仇无所作为，也时刻受到良心的谴责；自入关以来，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现剩下不足三十万，再这样下去别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就是东北军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他开始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作战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便无从谈起”。因此，他在五中全会期间说道：“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认为不抗日则不能统一”^①。“攘外安内”，只要以抗日相号召，国内各派力量自然共赴国难，实质上是先联合后抗日。如果说以前他选择的统一手段是拥护蒋介石，由和平转到了武力，那么现在他却是怀疑蒋介石，又由武力转向了和平。因此，“安内攘外”统一抗日与“攘外安内”抗日统一不仅仅是顺序上的颠倒，还是质的不同，是他对以往经验教训的高度浓缩，是他统一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也是他对蒋介石错误政策的根本否定。

3. 抗日统一，捉蒋送蒋

张学良为尽早使他的这一新统一观付诸实践，便开始寻找具体途径。他秘密接触了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坐牢的杜重远，谈了自己的苦闷和看法，并接受了杜的“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主动与杨虎城开诚布公消除误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

会，又想方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并先后在洛川和延安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议和双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是他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否则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他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他错就错在把“剿共”看作抗日的前提，因此，他决心与中共联手“内劝外逼”共同扭转蒋之政策，使其尽快放下内战的屠刀，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为此他作了多方面的准备：政治上，他向广大官兵加强抗日的宣传教育，办各种抗日刊物，如《东望》、《活路》等，并亲自到长安军官训练团作《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外部联系上，他分别派人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和山西的阎锡山等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联络新疆的盛世才，打开国际“通道”以求得到苏联对抗日的援助；军事上，他举办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学兵队培养抗日骨干，保护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也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向蒋进谏直陈。然而，蒋介石固执己见，不仅不接受张的合理建议，反而变本加厉步步升级：在上海，公开查封抗日刊物，逮捕救国会领袖；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两个张、杨难以接受的方案；西安“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又拟武力弹压格杀勿论。面对这些疯狂的举动，张学良再三苦谏哭谏，得到的却是“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的绝望答复。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为了国家与民族，张学良不得不铤而走险向蒋介石施行了兵谏，并宣布，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如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之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①当蒋对谈判协议表示同意接受时，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蒋返宁，为事变的和平解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决迈出了最关键一步，从而使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中华民族开始由内耗走向内聚，分裂走向团结，内战走向抗战，并最终取得了中国反侵略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使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的实践再一次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这也说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动因是以逼蒋的形式来实现自己拥蒋抗日统一的目的，也是他的新统一观由思想到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

综上所述，张学良息争统一的愿望使他厌恶战争、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他统一御侮的成见使他易帜、助蒋、拥蒋“剿共”，由正确走向错误；他非抗日不能统一的思想飞跃又使他逼蒋联共抗日，由错误回归到正确。可见，张学良的所谓矛盾现象，实质上并不矛盾，只不过是他的国家统一观不断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他的统一观是沿着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的轨迹运行的，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无论是制止战争、改弦易帜、入关助蒋，还是拥蒋“剿共”、捉蒋送蒋，都可说是他统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统一思想又是以民族息争御侮复兴为目的，以遵行父愿，拥护蒋介石为实现手段的。尽管他的这种实践的效果与动机出现过某种程度的背离甚至严重背离，但他那促使祖国统一的至诚却可质之天日！为此，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无怨无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解禁后，他建议两岸开诚布公地谈谈，希望和平统一；提醒国人不可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对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为祖国统一出力^①。世纪老人百年追求，体现的是国家统一这一最高价值。正像他的朋友贝祖贻夫人所说：“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② 他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树立了

① 石四维：《百岁英雄张学良》，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24页。

② 王朝柱：《说不尽的张学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